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0.03.014

禁忌、耻辱与恢复 ——曹杏花复论

程小强

(宝鸡文理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陕西 宝鸡 721013)

摘要: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写实作家刘恒的短篇小说《狗日的粮食》塑造的“瘦袋”曹杏花形象,因其复杂而深刻的意蕴备受读者和学者的关注,从求存本能与乡村伦理冲突的角度重新审视曹杏花这一典型形象,对于深化新写实及刘恒创作的研究仍具相当价值与意义。由是观之,《狗日的粮食》描写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曹杏花在不断磨砺求存技能的过程中与乡村伦理之间爆发的全面冲突,其一方面呈现出曹杏花罕见的生命韧性与天才式的能干,另一方面则表现了曹杏花之存在对乡村生产组织、乡村宗亲伦理、传统家庭男女关系、人之为人的生存尊严底线等禁忌的成功冲击。在艰难时世,曹杏花的种种逾越行为在求存外衣遮掩下看似无可厚非;但当生存威胁解除后,一度被打破的所有乡村人伦秩序必然重建,曹杏花之死正是所有耻辱回潮之后的必然结果。曹杏花之死鉴照了一个时代的残酷与弱者人生的终极悲哀,《狗日的粮食》也指向了一个时代的堕落和这个时代对普通人、弱者生命的践踏。

关键词: 《狗日的粮食》;曹杏花;生命韧性;乡村伦理;禁忌;耻辱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0)03-0103-07

引用格式: 程小强.禁忌、耻辱与恢复:曹杏花复论[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5(3):103-109.

Taboo, Shame and Recovery: Recapitulation on Cao Xinghua

CHENG Xiaoqia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Baoj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Baoji Shannxi 721013, China)

Abstract: In the mid-1980s, an image of Cao Xinghua in the short story named *Damn Food* of Liu Heng, a writer of neo-realism,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readers and scholars because of its complex and profound connotation. It is still of considerabl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for deepening research of neo-realism and Liu Heng's creation to re-examine the typical image of Cao Xinghu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survival instinct and rural ethics. From this perspective, what *Damn Food* describes is China in the 1950s and 1960s, and Cao Xinghua's comprehensive conflict between the process of constantly learning survival skills and rural ethics not only shows Cao Xinghua's rare life resilience and genius ability but a successful impact on taboos such as

收稿日期: 2019-11-02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代虚无主义文学思潮研究”(19BZW137)

作者简介: 程小强(1982—),男,甘肃镇原人,宝鸡文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20世纪中国重要作家作品和中国现代文学思潮。

rural production organizations, rural clan ethics, traditional family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les and females, and the bottom line of human beings' dignity of living. In difficult periods, Cao Xinghua's various overstepping behaviors under the cover of survival seem to be unimpeachable. However, when the threat of survival was lifted, all those broken human relations must be rebuilt, so Cao Xinghua's death is the inevitable result after the shame tide. Cao's death mirrors the cruelty of an era and the ultimate sorrow of the life of the weak, and *Damn Food* also points to the depravity of an era and the trample to ordinary people and the life of the weak.

Keywords: *Damn Food*; Cao Xinghua; life resilience; rural ethics; taboo; shame

新时期著名作家刘恒发表于1986年第9期《中国》杂志上的短篇小说《狗日的粮食》注定给中国当代文坛留下浓重的一笔。该作成为研究者一致确认的“新写实”小说的开端与代表作,小说接续新时期文学的反思与批判意识,叙写了当代中国特殊国情给予挣扎于生死线上的普通人以深沉而持久的灾难性影响,尤其“淋漓尽致地写出了处于窘困生存状态中的人们所经受的生存的磨难和挣扎”^[1],在一定意义上成为1985年以来新时期文学在文学探索上的首个分水岭。《狗日的粮食》发表后,众多的研究者对曹杏花这一形象进行了评析,其中一批具有新视野、新方法和新思维的研究者竟不约而同地瞩目于曹杏花经由性与粮食的获得所证实的生命力,一些论述甚至反复纠缠于食与性的辩证关系上,对曹杏花之死极少同情,反而对其奋争的一生极尽刻薄,比如“单纯地写对粮食的依赖和渴求似乎显得单薄,从这个方面看,‘借性写食’又有着辅助和补充作用。事实上,在表现原欲的作品中,食和性几乎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兄弟,缺少了其中一个都会显得不够丰满”^[2],“《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和《白涡》等,可以看到作家对于生存的基本欲望(食、性、权力等)的关注,并流露了人很难摆脱欲望陷阱的宿命情绪”^[3]等论点。可以说,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界和学术界欠《狗日的粮食》与曹杏花一个公道。《狗日的粮食》作为深刻的现实主义杰作,是刘恒基于其“少年时代生活的农村中的农民困苦处境”的“某种总结性思考”^[4],其深刻反省重创社会下层弱者人生命运时代原因之意图尤其值得我们重视。至此,刘恒创作上的人道主义追求,其反省历史、砥砺人性良知等叙事意旨,已然超越1980年代的文学潮流,而具备了深远的

文学启示意义。“瘪袋”曹杏花作为《狗日的粮食》的主人公,其坚韧的求存意志,坎坷、屈辱的生命历程,悲剧性的人生结局无不指向一个非常态的时代,彰显着1980年代中期以来现实主义文学突围转进之后的伟大生命力。

一 逆势顺时的求存韧性

一般小说所叙人事之时代背景都较为清晰,《狗日的粮食》却没有交代故事发生的具体背景,不过,从小说所述事件和人物活动的方方面面不难推定其故事大致发生于1949年之后的30年间。小说的叙事起点——杨天宽背着200斤谷子出门换娶曹杏花,大约在1950年代前半期。故事结束之际,曹杏花的儿女们陆续进城后俱已成家且育有子女大约在1980年代前半期,或者抵近小说写作的1985年前后。新中国在这30年间经历过由极其严重的自然灾害等原因引起的极端饥饿事件。在绝大多数民众罹遭饥饿折磨的时代,活下来为第一要义,此番艰难求存成为共和国以来两代人生命中最严肃、最沉重与最刻骨铭心的集体经验。其表现在文学叙事上,既有少数作家不负责任地虚构一个个对战胜非常时代非常灾难的传奇故事,也有作家认真负责地叙写下层民众在这个过程中对灾难的忍受与力所能及范围内的艰难求生,还有相当一部分作家则出于种种禁忌而默不作声。刘恒既不回避,亦无矫饰,他勇于直面历史灾难与复杂人性。

《狗日的粮食》的主人公曹杏花对饥饿的克服寓传奇于写实中:写实在于,曹杏花所有围绕获取食物的努力均基于特殊年代里普通人的求存意志而展开,这是小说的根本特征;传奇在于,曹杏花以非常人之病态身躯与杨天宽孕育了6个子

女，并以一己之力使一家八口安全度过那个几乎家家添新坟的年代。无论写实，还是传奇，作品无不指向曹杏花在艰难时世里不断磨砺求存技能的过程中呈现的生命力。曹杏花是个极其能干的女人，这主要表现在她维持一家人生存努力过程中所展现出的近乎卓绝的获取粮食能力上。细梳小说叙述脉络，曹杏花获取粮食主要有三条途径：一是以常人难以企及的劳动强度生产粮食，小说有两处描写：

女人果然勤快。扛了锄头、吃食，在圪圪搭个草棚，五宿不下山。白天翻坡地的黑土，两口子一对儿光膀，夜里草铺上打挺儿，四条白腿缠住放光。不下三日天宽就蔫了，女人却虎虎不倦，净了地留丈夫在棚里养精，独自下山背回一篓一篓的山药种。种块切得匀，拌了烧透的草灰，两炸一颗掩进松软的泥土。这女人很会做^{[5]3-4}。

日子苦，但让她得些怜悯也难。她做活不让男人，得看在什么地界儿。家里不消说了，推碾子腰顶主杠，咚咚地走，赛一头罩眼牲口，能把拉副杠的小儿小女甩起来；从风火铳背柴到家里，天宽一路打六歇，她两歇便足了，柴捆壮得能掩下半堵墙；担水一朝一夕十五担，雨雪难阻，五担满自家的缸，十担挑给烈属、军属，倒不是她仁义，而是每日四个工分诱着^{[5]7}。

相较于杨天宽时时打蔫与只有借粮的本领，曹杏花不仅有性能力为标志的旺盛生命力，更凭借高强度劳作获取了一家人的基本口粮；给军烈属挑水挣工分本属“加班”，而她做来貌似不费多少气力。此为其开源之道，至于小说叙以舔碗、给粮食里加绿菜叶子等各种能入口食材之类行为则属其节流之道。在饥饿极其严重以致家家有新坟的年代，这些付出显然还不足以维系这个八口之家的基本生存，所以，曹杏花为生存而使出了浑身解数，甚至公私财物兼偷。对此，小说有过三次生动的描写。一次是曹杏花将邻居家栽种而藤蔓爬过院墙的即熟葫芦、茄子收割后煮给一家人吃。俗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偷邻居食材事件必然快速恶化邻里关系，可脾性粗蛮泼辣的曹杏花却完全无所顾忌，反在对骂中占了上风。一次是杨天宽无法从堂兄杨天德处借来粮食，曹杏花携私愤“到天德菜园儿里将白日瞄下的一颗南瓜摘来，放了盐煮，待天德在菜园儿里揪着秃秧

跳脚，天宽的孩儿们已经拉出了南瓜籽”^{[5]4}。要说偷邻居的是为失德，偷堂兄的则稍违人伦，但无论失德，还是违人伦，在曹杏花看来都不是问题，活下来才是王道。这是曹杏花的务实处，其内隐着她对非常时代与非常环境的清醒认知和极具韧性的适应能力。还有一次是偷公家粮食：

怪不得不只一项。她身上有口袋，收工进家手不知怎么一揉，嫩棒子、谷穗子、梨子、李子……总能揪一样出来。日积月累，也不能说是个小数目。但谁也逮不住她，不知道口袋在什么地方。有猜在裆里的，虽说是老娘们儿终究不是可探的地方，证实不易。或许又是人家不愿逮她罢了。天宽未必明白小秋收的底细，他只明白起初女人只是嘴坏些，有了孩儿，肚子一紧蹙，她的手便也坏了。不能说，他嘴打不过她，手打怕也吃力。况且养活一堆活口，女人的本事哪一样都是有用的^{[5]7-8}。

这段论述极其生动且颇富喜剧感。偷向邻居和堂兄只是她偶尔为之，在漫长的集体劳动岁月里，她从集体劳作处每日夹带财物，且数量达到相对惊人的地步。这已经不是一般的聪明，而是超越普遍意义的天才式的能干。此类做派虽有违公德与社会公平，但在面临由饥饿引起的终极生存困境时，却是当时她能做出的最优化选择。

饶是如此，活下来仍是个难题，在当时出现诸如为了生存而吃骡粪这类极端行为也就不奇怪了。刘恒的小说创作多寄寓存在之思，让人物处于极限化的境遇下凸显极端求存方式之荒诞与非人性一面，此为刘恒组织小说的道与谋。中国历史关于饥饿的极端化记载中有吃树皮、草根、老鼠、吃人甚至吃观音土的，但鲜有关于吃粪的记录。《狗日的粮食》中最为触目惊心的场景之一即是曹杏花“从驮山炮的骡子屁股下接回一篮热粪”，被天宽误倒入猪圈，曹杏花发现后，多次淘洗终于淘出“整的碎的玉米粒儿”，然后“一锅煮糟的杏叶上就有了金光四射的粮食星星，一边搅着舌头细嚼，一边就觉得骡儿的大肠在蠕动，天宽家吃得惬意”^{[5]6-7}。此番场景在中外历史记录与文学叙事中极为罕见，洪子诚先生即指出：“与严酷的自然、历史文化环境相关的生存困窘和压抑所导致的人性扭曲、变态和卑微化现象，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揭示。”^[6]此中植入了刘恒对1950至1980年代底层中国的观察与思考，艺术化地牵引

出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是如何活下来的存在主义命题,以及事过境迁后,又应以什么样的勇气和方式面对无法言说的个人史与家国史。这是悬在每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利剑。刘恒的写作对那个时代的中国和生于其间的中国人包括他自己全部不留情面。时代、人生就是如此荒诞,在荒诞中的极限求存法则呈现了中国人非常态的求存能力与生命韧性,并在极具深意的讽刺中凸显创作者的深刻同情。至于曹杏花在求存过程中的种种作为则完全打破了乡村生产/组织秩序与伦理道德禁忌,故事由此得以推进,悲剧则已然命定。

二 打破禁忌与强人意志

全村人在曹杏花死后不久将其全然淡忘,透射出这个乡村共同体对曹杏花的否定态度。遗忘的原因在于曹杏花在求存动力支撑下的剽悍粗野的人生态度和敢于向洪水峪村几乎所有阻碍其谋粮者“亮剑”的叛逆行为,可以说,曹杏花挑战并打破了这个自成体系的乡村几乎全部的禁忌与原有伦理道德秩序。对此,小说叙事主要从以下五个层面展开:

其一,于公/于私劳动的两重境界打破了乡村生产组织禁忌。历史证明,1958年以来的“大跃进”“浮夸风”在中国乡村最重要的影响就是集体劳动与“大锅饭”路线的全面实践,其极大挫伤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但由于“大跃进”时期的中国乡村基层政权早已全面建立并高效、强有力地组织着生产,所以,即使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不高,也鲜有敢于公然反抗者,至于那些明显拖后腿的劳动者,也会经过轮番改造,直至服服帖帖。在此背景下,曹杏花于公于私的两重劳动境界,证明她就是这个高度规训化时代生产禁忌的强力破坏者,而且她的破坏还是那么理直气壮、身心如一、潇洒自如:“一上工立即筋骨全无,成了出奇的懒肉,别人锄两梯玉米的工夫,她能猫在绿林深处纳出半拉鞋底,锄不沾土;去远地收麻,男背八十,女背五十,她却嫩丫头似的只在胳膊窝里夹回镐把粗的一捆。”^[57]当受到村长训诫时,曹杏花在政治/革命话语主导下的纯洁时代里罕见地启用性禁忌类脏话进行回击,村长显然没有针对此类脏话的认知与反应预期,只能无

可奈何地默认她的行为。在这个循环中,有意借用性禁忌来打破制度禁忌成为关键,一个普通女性在以求生存为唯一目的非常时代对制度作出的嘲讽与挖苦,也凸显了此类制度的不合情理与纸老虎特征,1980年代以来轰轰烈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对这一恶劣制度的彻底革命。

其二,以获取食物为根本目的、以性禁忌为基础的高超骂人本领,挑战中国乡村的乡邻道义。中国人向来重视邻里关系,“远亲不如近邻”就是和睦邻里关系的重要写照,人情练达的曹杏花本应通达于此,但于她而言,求存压力显然已远超遵守伦理道义等道德的需要。在曹杏花摘葫芦茄子与邻居的对骂中,诸如“不骂人,只骂葫芦。骂得很委屈,葫芦成了骚娘们儿,把漂亮身子递过墙,将清白的瘪袋勾引了”^[58]等等。曹杏花骂人适逢中国共产党已建立农村基层政权并高效组织农业生产之际,《暴风骤雨》《三里湾》《创业史》《山乡巨变》等小说肯定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鼓励下由落后走向革命、由愚昧走向文明的史诗巨变,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完成、知青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等核心制度的设计与实践,使一代翻身农民在人格道德上具备相当的优越感,进而占据道德高地。《狗日的粮食》则反其道而行之,创作者将曹杏花置于具有存在主义意味的极限化环境中,让其延续旧中国农民剽悍、粗鄙等性格的同时,又赋予其敢作敢为、勤劳忍耐等貌似两极实则统一的性格,进而将曹杏花的形象置于乡村基本道义与人类基本生存诉求的矛盾面上进行考察。曹杏花在最低限度的生存诉求与乡村基本伦理之间,毫不含糊地选择了前者,并依托基本生存诉求最大限度且名正言顺地破坏了中国乡村成于治世的基本伦理秩序。

其三,强人意志与打男人事件颠覆传统中国男女关系模式。男权中心主义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的男耕女织模式成为中国封建家庭的基本生产/组织结构。这一结构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入、广泛、持久的影响。古语言牝鸡司晨即该杀。传统女性一旦在家庭占据强势地位,其结局大多是悲剧。男强女弱是为伦理秩序,女强男弱是为伦理大忌。曹杏花由泼辣能干、吃苦耐劳而培育的强人意志在瞬间打破了男强女弱的

传统家庭伦理格局，在那个女性主义尚未兴起的时代尤其不可思议。小说有个重要细节，曹杏花捡拾骡粪带回家晾晒时，被杨天宽误倒入猪圈而对其大打出手。回溯此前，曹杏花初见杨天宽之际，就从性的层面占据主动，一则因曹杏花已多阅世事，在嫁给杨天宽之前已连续被人卖了6次，充分见识过各式异态人性和各种艰难复杂的场面，身上磨砺出一股痞劲；二则因为曹杏花在劳动、获取粮食等维持一家人生计的能力上比杨天宽强得太多，相形之下杨天宽更像一个“吃软饭的”；三则和曹杏花的直爽刚烈相比，杨天宽更多的是顺时守势、得过且过的弱者心态和怯懦脾性，所以在长时期的生死线上挣扎之时，曹杏花以个人能力为依托而具有绝对的话语权，她是真正的一家之长；四是曹杏花的这种一家之长的威风、剽悍和刚烈由家庭内部全面延伸至整个乡村伦理体系并以此争取到一点一点粮食，确保了一家八口没有困毙于生死线上，而杨天宽显然不具备这个能力。中国传统人伦关系讲求名正言顺、各守其位、各谋其事，讲究秩序与规则的绝对地位，但在现实中也认可成王败寇、能者居之的历史选择，此为曹杏花得势之必然；另则，当解决眼前求存需要与遵顺人伦禁忌矛盾时，曹杏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求存需要，而非不能当饭吃的人伦禁忌，此为曹杏花的高明处。可凡事总有两面，高明未必全部正确，高明背后也许隐藏着呼之欲出的重大危机。

其四，不给丈夫堂哥杨天德借粮食并与之彻底决裂触碰宗法伦理底线。中国传统人伦讲求父死兄为大的秩序，杨天德尽管只是杨天宽的堂兄，但在洪水峪村仅存的两户杨家人中，杨天德无疑具有兄代父为大的伦理地位。即使1949年之后，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根本变革，但并未同步全面颠覆乡村伦理秩序。曹杏花因意识到自己极高的生育能力叠加即将到来的饥饿时代，在山药大丰收后她选择了窖藏粮食而断然拒绝堂兄杨天德的借粮要求。此事首先违背了家族亲情伦理。作为果报，宗法伦理随即崩溃，杨天德成为杨天宽在洪水峪村唯一无法借到粮食的人。面对此情此景，曹杏花没有积极反省以顺从伦理秩序来修复关系，反而深怀报复心态去杨天德菜园子偷摘南瓜以糊口。两个回合下来，曹杏花圆满地报了仇，且为

八口之家解决了一顿餐饭，这也成为其在求生意志主宰下的强人意志对人伦禁忌的又一次冲击。

其五，吃骡粪的行为严重触碰人之为人的生存底线。《狗日的粮食》将生存诉求置于具存在主义视野的极端严酷境遇中加以拷问，吃骡粪事件丰富了中国人面对极端饥饿境遇时对食材的选择。吃骡粪行为既是人类求生存意志最极端最强烈的呈现，也是人在求生意志下对人类生存底线的一再突破和人类尊严基本面一再降低的结果。把人之为人的尊严作为禁忌与人类求生存本能意志既高度合拍又高度分裂且扭曲地结合在一起进行叙述，此为当代中国文学叙事中至为惨烈的一幕。以流行的童年经验决定论而言，曹杏花死后之所以被其子女们遗忘，其中原因就在于曹杏花以此类带有打破生存尊严/禁忌的求存方式让他们的童年求存体验极其不光彩甚至倍感侮辱，儿女们显然将吃骡粪行为看作是自己一生的耻辱。

因为曹杏花的存在，使得中国乡村社会几乎所有的家国、政治与人伦禁忌在这个特殊年代里均如纸老虎般不堪一击，因为这些建立于足够温饱基础之上的人伦道德禁忌不能为曹杏花带来一点粮食，反而成为她寻找粮食过程中一道又一道障碍。曹杏花是个强人，她做事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其通过长期谋划来打破种种禁忌的目的，仅仅为了求取最低限度的生存。在当时的生存环境下，打破每一个禁忌都需要付出相应代价，只是相比亲人生命而言，其显得微不足道。曹杏花的种种作为就是在最低限度内谋求最低级别的生存诉求，在最高限度上则是一个极限化时代里强人生命意志的强力呈现。以前者言，曹杏花的目的达到了，家家有新坟而杨天宽家没有新坟，但以今日所言“出来混的迟早都要还”等“种因得因”思维回溯后者，以强力意志破坏种种禁忌必然要付出代价。这样，曹杏花之死也就呼之欲出了。

三 耻辱与恢复

曹杏花在努力争取粮食只为求存的动力支撑下，几乎冲破了1949年之后中国乡村社会所有的家国、政治与人伦道德禁忌。针对乡村生产秩序、乡邻道义、宗族伦理的禁忌破坏多属带公共性质的人际交往行为且无违法犯罪之实，其不会直接影响曹杏花的生命，吃骡粪行为有碍生存尊严亦

只为保全性命,但以打丈夫为代表的触犯中国传统家庭人伦禁忌并在很长时期维持女强男弱关系的行为就不一样,因为中国封建时代以来的家庭人伦中只有男人打女人的份,只有男人一定强于女人的意识与实践。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杨天宽面对极端饥谨的束手无策和曹杏花的足智勇为形成了鲜明对比,进而两人在家庭地位上高低立见。作为丈夫的杨天宽多年来从不敢在曹杏花面前出大声气,在家庭中处于绝对从属地位。曹杏花在为求生存获取粮食过程中顺带降服丈夫杨天宽包括言语侮辱与肉体打罚的行为必然严重辱没一个正常男人杨天宽的尊严,但曹杏花对破坏这一禁忌可能带来的危机毫无所察。杨天宽自认无能,但不等于他没有男人的尊严,在尊严遭遇无数次践踏过后的服服帖帖貌似甘于认命,实则是男性中心视域下的男权意识复苏前长期的隐忍,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有志者事竟成、卧薪尝胆等说辞多关乎男性尊严。显然,杨天宽只要捕获到合适的机遇就会不可遏抑地为尊严而战,曹杏花挨打进而送命是为必然。

曹杏花之死源于一次去镇上购买返销粮的惯常经历,选择自杀的曹杏花也由此结束了自己“罪与罚”的生命历程。她在赴镇上购粮途中于路旁大石头边解大便时,将购粮钱证无意间丢落到草丛中,直到抵达公社粮栈柜台前,她才发现丢失了购粮证,她“当即便嗷地怪叫一声,跌倒地上吐开了沫儿”。作者将这一现象归结于曹杏花“生就的急性子”,而稍事考察曹杏花从此刻开始的反应——她在一阵身体僵硬之后吐出的词是一连串“丢了”,就足以证明丢了购粮钱证会对她造成天大的灾难。为了补救,“瘪袋哭软了,一辈子刚气,不知哪儿积了那么多泪。她打了两个来回,把十几里山路上每块石头都摸了,又到灌木林儿里脱光,撅着腚撕衣裳补丁,希望里边藏点儿什么。”^{[5]11}这些超出一般常人丢东西的反应大不寻常,曹杏花的反应只能证明其清晰的意识到冲撞某种禁忌之恐怖。随着温饱问题解决,触犯前述大部分禁忌对曹杏花的当下生活了无影响,只有曾经打骂丈夫行为且至今仍维持女强男弱的家庭伦理关系所触犯的家庭人伦禁忌的影响持续发酵到令人发疹的程度。此次丢失购粮钱证事件给了杨天宽一个契机,他借曹杏花犯下的错误得以恢复已

被颠覆的男性中心地位,重树自己作为男性在家庭中丧失已久的威权。曹杏花明显意识到了这点,所以她进家门时的“愣了神儿”,不是一般的紧张,而是有一种灾难降临的清醒与无可奈何,内心充满着深刻的恐惧(“女人猫似的”),遭杨天宽暴打之际,她没有丝毫反抗。杨天宽则借此完全释放了家庭夫妇伦理长期失衡之后的心理/人生/人性压抑:“竟扑上去无头无脸一阵乱拍,大巴掌在女人头上、瘪袋上弹来弹去,好不自在。乡人们蹲在夜地里听,明白瘪袋的男人又成了男人,把女人的威风煞了,半世里逞能扒食,却活生生丢了口粮,这是西水女人的造化。天宽,往死里揍她!”^{[5]11-12}单纯就此事件而言,曹杏花挨打不在于丢失财物,杨天宽没有打曹杏花的必要。如看客般的众乡民的反应间接证实他们对杨天宽维护禁忌的认可,并将曹杏花遭受破坏禁忌之后的惩罚看作天经地义。作为看客,他们也曾长期饱受曹杏花破坏乡村诸种禁忌之苦,洪水峪村和杨天宽已经容不下曹杏花的存在。以曹杏花而言,她明白丢失购粮钱证的意味,也清晰地预见经过此事所有禁忌重回之后的人生景象,罪通过责罚可以被缓释,而“半世逞能”的曹杏花就此开启了人生耻辱之门。一辈子辛劳而最终无人认可,一生心系粮食维系一家人性命于饥谨年代,一路将耻辱全部施加给别人,曹杏花却从未料想到即使能干如己者亦有百密一疏。此番不小心丢失钱粮证之过错被上升为罪,进而经过杨天宽与众乡民看客般的不当惩罚最终导向了根本无法被缓释和克服的人生耻辱,她至此变成洪水峪村和杨天宽家中的“多余人”:“罪可以通过忏悔来洗刷,耻却不能……因为失去了宗教那自我净化的过滤系统,罪就变成了无法消化的,坚硬的耻。”^[7]最后她吐出了一个时代终结之后的绝望之声:“狗日的!”“粮……食……”这是最后的绝望反抗,后悔、无奈、憎恨、绝望及怒气冲天一应情感力透纸背。刘恒和一批50后、60后作家一道“将个体成长记忆融入到作品中,以颠覆或嘲讽的方式于非理性的文化语境中尽现个体人生与时代错位下的精神创伤”^[8],更以其天才般的艺术结构法弹奏出历史/时代摧残下底层人生/人性的最强音。

曹杏花的死鉴照着—个时代的残酷与弱者人生的终极悲哀。曹杏花一生极其节俭粮食,对自

己的饮食已然苛刻之至，她去镇上购粮途中的排泄物是“两节不大新鲜的绿粪”。“两节”暗示进食量严重不足，至于“绿粪”则稍有常识者即知是因过多食入绿叶菜而致。以曹杏花的家口之众，她根本没有机会食入大量绿叶菜，只能是食用太多野菜而致，这从小说的反讽叙写可看出：“脏物如有幸石化，即使后世的考古学者出丑。他们将陷入历史的迷宫，在年代和人种问题上苦苦纠缠。”^{[5]13}或许这既是曹杏花的生活习惯，也是现实窘迫，即使可购买返销粮而要养活八口之家亦非易事，她会吧能吃的都留给儿女，自己则用野菜类敷衍肚子而已。小说的反讽修辞指向一个时代和这个时代对普通人、弱者生命的漠视与践踏。即使如此，一个一生将全部精力置于获取粮食养活一家人的曹杏花死后的直接作用亦在于以死成全包括自家人在内的全村人一顿饱食：“一袋粮食买回，刚够助丧的众乡亲饱食一顿，天宽的一家自然也扎进人堆抢吃，吃得猛而香甜。他们的娘死也对得起他们了。”^{[5]14}作者刘恒道出了一句大实话，他们的娘太对得起他们了，当众儿女此后很快完全忘却了自己的娘时，曹杏花那“丑狠了”的“瘪袋”强化了儿子二谷对“甲状腺肿大”疾病的认知，其死法也教给了儿女们不能吞食苦杏仁的经验并传之下一代。实质上，《狗日的粮食》中曹杏花之死是饮用了苦杏仁熬煮的苦水而非大多数评论者与阅读者所认定的嚼食苦杏仁，所以有论者所言苦杏仁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当然站不住脚，如“它是毒药的代名，是能够剥夺夺人的生命的‘毒药’，而这种毒药又戏剧性地充当了粮食的角色”^[9]之论。从有关杏的文学寓意来看，杏和苦杏仁无论在何种语境下都不是毒药的代名；从自然属性来看，苦杏仁脱苦后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此类毒药说当属无稽之谈。《狗日的粮食》以反讽之笔道出人性之丑，既是对曹杏花作为一个伟大母亲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般付出的别扭叙写，也是对“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的抽象精神的反讽写实。对于曹杏花的众儿女而言，他们全然颠覆了中国传统关于“儿不嫌母丑”的人伦道义。

在非常时代的生死线上，曹杏花触犯所有禁忌只为维系一家人生存，并进而付出了生命代价，其儿女们则在幸福环境里无所顾忌地触犯中国传统人伦禁忌而心安理得，到底谁更没有人性？曹杏花用毕生心血乃至性命种下“龙种”，最终收获的却是“跳蚤”。小说结尾处，杨天宽满怀悔意在曹杏花的坟头上蹦跶，显示出一个中国底层农民的朴素情义与民间道义的苏醒，这也可以说是小说在人性之恶叙写外的些许温暖处。

行文结束之际，有一点需要说明。本文称呼主人公为曹杏花而非小说几乎通篇使用的称呼“瘪袋”。“瘪袋”俗称大脖子病，实源于落后的饮食及医疗条件在该病防治上的无力与知识普及欠缺所致，是国家治理能力不足落在个体尤其是那些乡村民众身上的结果。考以一般人伦道德，称呼曹杏花为“瘪袋”，就是揭人之短。俗话说骂人不揭短、打人不掌脸，这也做人的底线；所以，本文称主人公本名“曹杏花”而非带有人格侮辱性的语词“瘪袋”，是为将“曹杏花”还给曹杏花。

参考文献：

- [1] 王铁仙，杨剑龙，方克强，等.新时期文学二十年[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281.
- [2] 汪艳虹，杨 宽.谈《狗日的粮食》里的“借性写食”[J].知识经济，2008(4)：163.
- [3]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46.
- [4] 林 舟，刘 恒.人生的逼视与抚摸[J].当代作家评论，1997(5)：127.
- [5] 刘 恒.狗日的粮食[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
- [6]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02.
- [7] 卢 冶.芥川龙之介与“文学侦探”：围绕着《六官公主》的时代谜团[J].读书，2014(2)：134-143.
- [8] 张春歌.城与乡互望中的人性图谱：以新时期以来江苏小说为例[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0(4)：65-68.
- [9] 王辰汐，杨红旗.被书写的悲剧：论《狗日的粮食》的悲剧生成[J].文学界(理论版)，2012(4)：18-19.

责任编辑：黄声波